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PARTIES**

全球化与世界 政党变革

主 编 史志钦
副主编 戴立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

主编 史志钦
· 副主编 戴立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 / 主编史志钦、副主编戴立兴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35-3745-5

I. 全… II. ①史…②戴… III. 政党 - 研究 - 世界 - 文集
IV. D5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75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燕华印装有限公司印装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95 千字

定价：28.00 元

前　　言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地区），除 20 多个国家（地区）无政党外，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政党，政党不但是民主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产物，而且是各国民主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现在，各国政党在本国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党、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趋势，政党变革已成大势所趋，而不变革的政党必然消亡。为应对这种挑战，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世界政党变革的情况，2006 年 3 月 9—10 日，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德、法、意、韩等国家，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 50 多名专家、学者与理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是把对世界各国（地区）的政党的发展变化放在世界政党比较的广阔视野中进行研究的，而世界各国的不同政党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都起源于欧美，有着共同的特质，它们都具有一般政党的属性。

此次研讨会召开之后，为了对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理论研究情况做一个总体性概括，以便为社会各界特别是从事中外政党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份详实、系统、新颖的资料，我们在研讨会的基础之上，特别编撰了这个论文集。本论文集是按照“择优选用”、突出中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原则，对所提交的论文进行分析整理，汇编而成的。

本论文集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一）全球化与世界政党的总体变革。通过分析全球化的特点、各国政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述了世界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和政党制度的多样化模式，揭示了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及政党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

(二) 国外政党的最新变化与发展。由于欧洲是各类政党的实验室，而且自上个世纪以来，相比而言欧洲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变化最为明显，因此，本部分重点对欧洲政党进行了研究，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地区。内容涉及全球化对欧洲政党的冲击、欧洲政党与政治的个性化、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与转型，以及西方当代政党的组织变化、新传媒在政党发展中的作用等理论前沿问题。

(三)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变革与创新。在当前多数共产党总体力量和影响下降的情况下，国外共产党纷纷对理论纲领和政策实践进行了调整，取向更加理性务实，但是许多国家（地区）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从中国共产党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牢固树立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密切党群关系仍然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点所在，相关学者重点对此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本论文集在编辑过程中，编者仅对部分文稿进行了文字编辑，收录论文只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看法。

本论文集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与会专家、学者与理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作为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对全体与会人员表示感谢！本项研究是清华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一项研究成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副校长刘江永教授对此次研讨会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支持。本次研讨会之所以顺利召开还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资助。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撰本论文集，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探索性工作，无论是在内容的选择方面还是在体例编排方面肯定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还请各界指正为盼。

史志钦

2007 年 6 月 10 日于清华园新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全球化与世界政党的总体变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	周余云 /3
挑战和前景：全球化中的政党	费迪南德·穆勒—罗迈尔 /10
当代世界主要政党的变革与发展研究	周淑真 /19
政党发展的比较研究	朱昔群 /34
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变化关系	皮埃罗·伊尼亚齐 /44
政党政府：涵义、运转、意义与发展趋势	柴宝勇 王 刚 /50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	张 丽 /62

第二篇 国外政党的最新变化与发展

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变化研究	徐 锋 /71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渗透	张世鹏 /80
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转型	史志钦 /95
欧洲左翼运动发展与“欧洲左翼党”	熊 炜 /109
全球化如何影响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变革	张志洲 /120
英国的政党财政改革及其对新工党的影响	王 军 /133
互联网在 2007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的角色和作用	奥利维尔·埃利弗 /142
代议制下的政党以及政治个性化	热拉德·格伦贝 /148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演变与发展	张文红 /159
作为一个欧洲政党的欧洲绿党：量化评估	郇庆治 /171
欧洲的民粹主义	艾里克·琼斯 /182
墨西哥大选折射出的政党执政规律	高薪军 /190

第三篇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变革与创新

共产党功能转化轨迹分析	戴立兴 /201
全球化背景下国外共产党发展现状及挑战	董卫华 /212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党治理的几个问题	王韶兴 /223

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张荣臣 / 231
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几个问题	刘红凛 / 238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	柴尚金 / 245

第一篇

全球化与世界政党的总体变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

周余云

冷战结束以来，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各国政党所处的内外环境，使各国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许多政党采取多种因应措施，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

一、新挑战

(一) 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传统政党不断衰退

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推动了一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传统工业逐步衰落，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就业人口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中产阶级已成为一些国家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主体，其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使得传统左右翼政党以阶级划分为其社会基础的现象被打破，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主流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出现流失，力量都有所削弱。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德国的社民党和联盟党，都是本国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以前的得票率之和都超过了90%，而现在下降到70%左右。社会结构的变化使西欧的工会组织普遍萎缩。历史悠久的英国工会1979年的组织率为53%，1996年便降到了28%；法国工会的组织率1980年为19.1%，1990年降为10.8%。德国工会组织率到1990年已降为34%。工会规模的缩小对以工会运动为力量基础的西欧社会党提出了新的挑战。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在近几年的大选中纷纷被淘汰出局，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等在分别连续执政71年、45年和32年以后下台。它们有的即使重新执政，但再也不能绝对垄断政权，力量出现滑坡。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成立以来独霸政坛70多年，但在2000年7月的大选中败给了在野的国家行动党。在去年大选中，革命制度党

力量继续下滑，退居第三位。9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洲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党也纷纷落马，重新改写了欧洲的政党政治版图。目前，保守党占据了欧盟国家的政坛中心。与此同时，西欧共产党影响力衰退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各党得票率平均下降2.5%。

（二）政治冷淡主义盛行、党员队伍老化流失

由于生产的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和个人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感与关注热情不断下降，忠诚度降低，不关心政党、不参与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日益盛行，青年一代对新社会运动的热心往往超过对传统政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政党难以招募到新生的政治力量，普遍存在党员结构的年龄老化，青年党员比例小等问题。据统计，法国社会党30岁以下的党员只占7%，德国社民党35岁以下的只占11%，21岁以下的党员只占1.3%，80岁以上的党员比例高于25岁以下党员。

此外，近年来在西欧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女权运动、极右翼思潮等，也拉走了不少传统政党的选民。根据2002年对欧洲、拉美和非洲的调查显示，政党的信任指数落后于宗教团体、总统、武装力量、法院和议会，排在第六位，这表明政党已经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因此，近20多年来，德国社民党党员减少了三分之一，从高峰的100万降到90年代中期的66万，法国社会党党员也从20多万降到不足10万。

（三）政党意识形态淡化、左右政党政策趋同

政党本应是意识形态特征最为鲜明的政治组织，但冷战结束后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向中间靠拢，纯粹的意识形态纷争逐步减弱，出现了“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现象。据1997年的民意测验显示，60%的法国人认为，在今日法国，左与右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党宣称“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明确提出要转向中间主义。而选民也不再以政党的政治分野和政策主张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而是越来越多地以经济、社会问题及政绩作为投票的依据，这迫使各类政党为赢得更多的选票，政策主张日益接近，实用主义越来越突出，政治特性面临被日益淡化的危险。西欧社会党认为，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西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正在丧失，个人主义急剧膨胀，团结互助的价值观淡化，客观上给西欧社会党维护和突出自身政治特性带来困难。尤其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争取中间阶层的认同和支持，西欧各国社会党近年来不得不对其传统经济社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采取了一些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国家干预，降低福利标准，推进劳动市场灵活化等。这些改革措施虽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

际竞争力，但也对社会党造成不少负面影响，动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理论基础，使社会党的理论政策与右翼趋同，政治形象逐渐模糊，冲淡了其作为左翼政党的政治特性。

（四）非政府组织日益活跃、大众传媒影响剧增

冷战结束后，国外非政府组织异军突起，逐步渗透到许多国家内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对各国的内政外交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仅与联合国新闻部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就有 1550 个。非政府组织没有提出执政或参政的政治要求，在行为方式上也有别于政府和政党，而主要关心与政治有关的具体事务，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公民权利、反全球化等运动。非政府组织虽结构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其号召力往往大于一般政党，现在已成为个人和政府之间的一条纽带，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一条渠道。它们通过著书立说、召开研讨会、举办讲座、利用或引导传媒等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挤占了传统政党政治的地盘，对传统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产生了强烈冲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具有多重功效：它既有宣传执政党政绩，扩大其影响，巩固其地位的积极作用，也有促使执政党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的监督功效，同时也有煽动对执政党不满情绪，妨碍社会稳定负面效应。现代媒体已成为影响群众情绪、左右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公众基本上也是通过大众媒体来感知政治的。因此，对任何政党来说，新闻媒体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始终处于媒体的多重压力之下。任何政党和政治家若不洁身自好，很可能在媒体的曝光和炒作下，亡党丧权或身败名裂。此外，政党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越来越依靠个人魅力而不是政策主张，越来越依靠传媒而不是政党，能否有效利用媒体赢得选民支持，成为关乎一个政党成败的重要因素。

二、新举措

面对上述新挑战，多数国家政党都在因应形势变化，积极探寻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工作，致力于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努力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探寻新的发展契机。

（一）注重理论纲领创新、扩大社会阶级基础

一些国家政党注重思想纲领、理论政策方面的革新，力求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包容性、民族性和时代感。西欧社会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普遍进行了一轮革新，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的“新中间主义”、法国的

“现代社会主义”、葡萄牙的“向中间靠拢”等口号纷纷出台。各国社会党革新的口号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想大同小异，都是在理论上“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嫁接”，以实现传统民主社会模式的现代化。

近年来，西欧社会党针对理论调整创新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再调整。2002年11月，葡萄牙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创新、调整和向社会开放的口号，认为创新、调整是社会党“不可逆转的目标”，强调要在思想理论领域“左转”，“回归传统”。英国工党针对中右政治势力挤占中间阵地势头及越来越多来自传统左翼的批评，布莱尔表示，“第三条道路”作为“进步政府的政治思想”已发展到“第二阶段”。法国社会党重申党的“社会主义”特性，主张要在保持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要准确把握民众的心理和期望，不断地对自己的目标进行更新，及时提出变革措施。这些调整表明，西欧社会党已开始对那场发端于90年代中期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理论革新进行新一轮反思和调整，谨慎“修正”前一个阶段在纲领理论方面的“创新”，渐渐回归传统，努力把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和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工作手段结合起来。

一些执政党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力吸纳社会新生力量和各方面精英分子，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力图塑造代表全民利益政党的形象，寻求跨阶级的支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党员以工人为主，80年代后，人民行动党大力吸纳中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入党。近年来，该党力图成为代表各种族、各阶层的“全国性运动”。目前，人民行动党成员包括手工业者、工人、店员、政府职员、教师以及工商企业界人士等。新加坡最有才能和最优秀的人才基本都被网罗在人民行动党内，有从工人政党—精英政党—群众政党发展趋势。德国社民党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从雇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直至企业家。英国工党要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工党”，用“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布莱尔一再宣称自己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讲话，提出工党不仅应成为“人民的党”，也应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法国社会党表示“有责任扩大的自己的代表性，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强调“社会党是一个阶级的党，我们的社会基础既不单纯也不狭窄”，主张党要“调和中产阶级与民众阶级的利益”，“取消在入党方面的种种限制”，建立包括被社会排斥者、平民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新阶级联盟。意大利左民党提出，要“向以不同的人权与价值观、共同的以人为本主义和保护环境作为中心任务的文化及运动开放，吸收它们的思想并加以革新，以应对现代化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挑战”。西班牙工社党主张“对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进取精神，应该非常开放和接近，必

须使社会党的组织结构应所有赞同社会党战略方案的公民的入党要求，必须使党的内部运转能够不断反映我们向整个社会所建议的多元制和参与制的价值”。

（二）改革组织活动方式，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一些政党对党组织生活采取开放式的态度，鼓励、允许非常群众参加党组织生活，加强与群众、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及各种新社会运动联系，借助因特网高科技手段，加强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与普通党员、党员与公民的对话和沟通，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利用大众传媒传递党的信息，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如葡萄牙社会党主张，在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必须高效、开放和现代化。2002年该党十三大选举产生的书记处由51人降为11人。该党还主张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强调党员在信仰和思想上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提倡多元化，提出“不怕分歧的立场，只怕迁就的沉默”。

针对网络技术正在以超常速度渗透到政治生活中的新情况，一些党充分利用新科技加强党内沟通，使因特网成为党的领导与基层党员，政党与选民进行宣传、交流和对话的政治平台。法国社会党主张建立涵盖全国的“法国社会党网站”，以缩小党中央与各省委之间的时空距离，在网上组织党的领导人与基层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见面，让党的领导人直接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通过电子刊物提高对话能力，利用因特网宣传党的思想和历史。德国社民党认为，因特网对社民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提出要使该党成为德国第一个“网络党”，通过使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党内信息沟通手段的现代化，提高应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先后启动了“红色电脑”与“红色手机”计划，争取在数年内使一万多个基层组织全部联入内部信息网，通过移动终端如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人及大部分党员发布消息。意大利左民党提出要“建立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通讯系统，以促进内部讨论，并迅速在组织网内传播有关党内生活、选择、会议和领导机构决议的信息”。越南共产党认为，传统的由上到下的信息传达模式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要借助因特网开展网上“在线对话”，从最高领导人到政府部长都可以与公众进行网聊。

（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树立党的亲民形象

多数外国政党普遍重视加强与群众（选民）的联系，通过深入基层群众，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树立党的亲民形象。为此，一些党还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如越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当选后，主要领导成员纷纷走向基层，针对群众申诉和集体越级上告案件日益增多的现象，越共在2001年和2002年先后派出由副总理或部长牵头的15个政府工作组分赴全国各地，敦促地方领导抓紧清理、解放积压多年的群众申诉案件和热点问题，严惩贪官，平息民愤，化解社会矛盾。老挝人民革命明确规定，政治局委员每年深入基层至少三次，贯

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地方开展工作，并要求地方简化陪同接待，禁止扰民。古巴共产党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到基层视察的制度，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 6 次到地方视察，其中 4 次必须深入到基层。古巴政党官员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基层各级领导干部，都分散居住在普通社区中，与基层群众生活在一起，接受居住社区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参加社区的集体活动和公益劳动。

一些党注意切实解决好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问题。新加坡李光耀认为，影响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小也是大事，是“真正的政治”。如公共厕所卫生是小事，但却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吴作栋在 1996 年将它列为新加坡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该党基层支部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建设上，重视解决社区排水、道路、交通和学校等问题，还开设幼儿园、办缝纫和烹饪培训班、举行文艺表演等。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日常积累在大选间获得很大的政治回报。

弱势群体的存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是各国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突尼斯宪盟通过其直接掌管的群众团体出面发动社会募捐，帮困扶贫。每年派出“医疗大篷车队”到偏远、落后地区巡回医疗，既解决了群众的缺医少药问题，又加强了宪盟与底层群众和边远地区的亲和力。

（四）坚决反对特权腐败、树立清正廉洁形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立时，李光耀就提出“打倒贪污”的口号，把党旗的基本色调定为白色，象征廉洁。李光耀经常对党员进行反贪倡廉教育，他说：“贪污腐败就是败坏我们的执政党，不予严惩，就会导致党的垮台。”新加坡制定了《反腐败法》，成立由总理直接领导的贪污调查局，并赋予反贪局较大的权利，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拘捕涉嫌贪污受贿的嫌疑犯，有权没收贪污的全部赃款。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曾接受印尼商人赠送的 7 张机票，携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 4 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是李光耀的挚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但反贪污局发现他曾受贿 50 万新元，他向李求情，李铁面无私，结果郑畏罪自杀。越南共产党强调“反腐无禁区”，规定所有党政干部必须申报财产，不允许配偶及亲属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所有中央委员都要对其分管单位和地区所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负责。2002 年 7 月，越共中央决定组织工作、基建投资和土地管理、党员干部“19 条不准”规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群众上访、申诉情况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大检查。其中前两项由中央政治局直接抓，后两项则由中央书记直接抓。

（五）加强公共关系建设、加大国际交往力度

一些政党注意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和引导，提高新闻媒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化解媒体对政党的消极报道，引导新闻媒体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努力提升党的正面形象。如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亲自做传媒大亨默克多的工作，对争取其控制下的媒体网络转向支持工党起了重要作用，工党对正面报道该党形象的记者也给予特殊关照。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注意在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主动与媒体打交道，举办新闻发布会宣传党的政策，引导社会舆论。法国社会党全国书记处书记都有各自定向联系的记者，可通过这一渠道及时将党内的有关方针政策及立场传达给广大选民与公众。德国社民党提出，要尽快将党从“新闻报道对象”变成“影响新闻报道的主体”，把“拥有与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该党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加紧向党的中高层干部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社民党还提出，要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复杂的政治决策、传递深奥的政治理论，以公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做宣传。

近年来，政党之间的地区和国际交往明显加大。其中，既有不同地区同一类型的联合与聚会（社会党国际），也有同一地区同一类型政党的交流与对话（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还有同一地区同一类型政党的会晤与合作（圣保罗论坛）。2006年9月，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个政党在韩国召开了第四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通过了《首尔宣言》，呼吁各国政党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新亚洲而努力。这些为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对话合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在全球化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震荡中，如何化解政党自身的危机、保持政党的政治生命力。具体措施会因国情、党情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只有顺时应变，适应时代发展，主动变革的政党，才会像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作者：中共中央外联部研究室处长）

挑战和前景：全球化中的政党

费迪南德·穆勒—罗迈尔

一、介绍

政党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文章。人们对政党有持久的研究兴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认为政党在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并成为拥有主权的人民与那些被他们委以短期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政治家们之间的重要纽带。换句话说，政党可以被看作是一切民主形式中为缓解拥有主权的大众与行使权力的政治家之间紧张关系的最重要的桥梁结构，即首要代理关系。这也是一些观察家（e. g. Schattschneider 1942）视政党为现代民主管理所不可或缺元素的原因之一。因而，没有人会否认，只有在了解了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成功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运作进行全面的评价与思考。

经验主义政治学倾向于关注政党的演化进程。西欧国家的政党大多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像迪韦尔热于1964年所指出的，政党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型”（如那些因为社会精英群体为应对选举权扩大而建立专门选举机器来帮助他们保持政治权力而产生的政党），另一种是“外生型”（如那些起源于社会动员的政党，他们是那些尚未获得足够代表权的群体寻求政治权力的途径）。在组织形式上，他们分别采取“核心”或“大众”政党模式。尽管存在“民主赤字”（cf. Michels 1911 and his “iron law of oligarchy”），很多观察家发现，后一种模式的竞争优势使得其组织形式成为其他政党组织努力效仿的对象。西欧也因此经历了一场“左翼风潮”（Duverger 1964）。此外，从政党理论研究本身来看，“群众整合型政党”（Neumann 1956）事实上已假设了某种政党模型或原型的存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政治体系危机，不仅见证了社会民主党的首次“失败”，也见证了极左和极右两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党派的出现。这就很容易